

東 莞 文 史

第二十四辑

杨宝霖 钟百凌 张明光

编辑

中国政治协商会议
东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

一九九六年一月

封面题字：吴南生

第二十四辑

(一九九六年一月)

东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

《东莞文史》编辑部编

《东莞乡情》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32开本 106千字

广东省非营利出版物准印证 93 粤印准字第 58 号

东莞文史

吴南生题



目 录

六十自述(遗稿).....	李章达	(1)
李章达传.....	叶文益	(15)
1926年李章达在广州公安局局长任内.....	徐思道	(60)
南方民盟的先驱——李章达.....	韩毅之 欧貽宏	(77)
翟俊千传略.....	徐思道	(84)
著名学者张仲葛教授.....	张 磊	(88)
防澡肝炎专家周庆均.....	强 华	(91)
李润亨先生传略.....	徐谈送	(94)
军医前辈袁荫槐事略.....	袁功甫	(99)
刘文亮先生传略.....	袁功甫	(101)
杨秀琼的乡贯问题 兼为范绍增辨诬.....	徐思道	(102)
虎门建党史略.....	邓慕尧	(110)
东莞在明代的人才与教育.....	杨宝霖	(121)
东莞电影简史.....	张铁文	(144)
东莞的新石器时代考古.....	王 健	(150)
东莞书画艺术考.....	王 健	(153)

袖海亭与邓尔雅题匾.....	罗 菁 (164)
容庚与钱穆的友谊.....	张 磊 (166)
草塘文社沿革及遗诗.....	谢肇凡 (168)
读莞人著作札记(二).....	杨宝霖 (171)
郑荣遗诗辑存.....	陈雪轩 (186)
李永昌佚诗.....	刘培棠 (202)
对联琐语.....	陈雪轩 (216)
中秋佳节, 铁水开花.....	叶振铨 (225)

[编者按]

李章达先生，人称“党外布尔什维克”。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正式召开，李章达先生“以多年从事革命工作的显著劳绩和在人民中的卓著声望”（古大存《悼李章达先生》），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。1949年10月19日，李先生兼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、广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，不久，兼任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。1951年12月30日，又兼任中共华南分局文教民族事务两个委员会主任，并任民盟中央常委、南方总支部主任委员。1953年12月9日在广州病逝，享年63岁。李先生逝世后，由叶剑英、李济深、张澜、林柏渠、董必武、邓子恢、李维汉、谭政、陶铸、程潜、张难先、李先念、陈铭枢、赵毅敏、张执一、陈汝棠、李达、陈漫远、何伟、冯白驹、陈其尤、李任仁等二十二二人组成治丧委员会。当时中央首长唁电有：

毛泽东主席唁电

广东省人民政府转李章达委员家属礼鉴：

李章达委员因病逝世，无任悼念，特电致唁。

毛泽东 1953年12月10日

周恩来总理唁电

广东省人民政府转李章达副主席家属礼鉴：

惊悉李章达副主席逝世，谨致悼唁。

周恩来 1953年12月10日

民盟中央委员会唁电

南方总支部转李章达夫人：

惊悉李章达同志逝世，谨致诚挚的悼唁。

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

12月10日

民盟正副主席唁电

南方总支部转李章达同志夫人：

惊悉李章达同志病逝，我盟丧失忠诚战友和领导工作者，不胜哀悼。谯电驰唁。

张澜、沈钧儒、章伯钧、

罗隆基、马叙伦、史良、

高崇民

12月10日

中南行政委员会主席代主席唁电

广东省人民政府转李章达先生家属：

惊悉章达先生不幸逝世，至深哀悼，特电致唁。

林彪 叶剑英

12月10日

今年，东莞市人民政府斥资出版李章达先生文集，在此，发表李先生传记资料，并征得李先生家人令媛李诵仪同意，登载李先生遗稿《六十自述》，以为对这位乡贤的纪念。

六 十 自 述

李章达（遗稿）

在我刚过六十岁之时，伟大的中国，已脱离灾难的深渊，中国人民是站立起来了。

六十年不算不长，但比起中国人民受苦的一百年来，它还是短些。自从帝国主义入侵以来，中国人民在苦难中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。前仆后继，再接再厉，直至今日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，团结四大阶层，完成历史上伟大革命任务。在这样伟大时代，厕身于光辉的革命行列，同每个中国人民一样的我，从黑夜走到黎明，那是多么愉快啊！

（一）

我们老年人的一代，是苦难中国的一代。我生在破落地主之家，十岁以前，我父母相继死亡了，以后依靠叔父生活。在东莞县城读完了“子曰馆”进入“大馆”，（即满清时的高级私塾）考过两次县试。到了十六岁那一年考进了广东陆军小学校，就在那时加入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，在学校里做宣传反清的革命工作。三个年头毕业后，升入南京陆军中学，在陆军中学两年间，时势演变很速，以四川为首的各地掀起了反帝的“争路潮”，穷苦的人民四处暴动，这是武昌起义的前夕。那时，我已负担同盟会秘密组织工作，与同盟会老干部谭人凤联络，这是我比在陆小时进一步的实践革命生活。我还记得同盟会宣言中有

这样激动人心的名句：“涤二百六十年之腥膻，复四千年之祖国，谋四万万人之福祉”，它号召了全国青年为脱离异族统治光复祖国而奋斗。

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，长江部分革命组织联合当地军人起义于武昌，其时，我刚在南京陆中举行毕业考试，一闻消息，便马上带领全组同志离校赶赴武昌，结合武昌陆军中学的同学们编成武装队伍，充当黄兴卫队。第一次开赴前线作战，是在汉口龙王庙码头登陆，战斗半日，不利而退回武昌，其后又随着黄兴进攻大智门车站的清军，未能击破敌军冯国璋的防御，退到汉阳，驻守兵工厂。将近一月，而有所谓“南北议和”。黄兴赴上海，我们这一队黄兴的卫队，无形瓦解，我于此时怅惘地回到广州。

本来自武昌起义后，各省宣告独立，革命军占领了南京，成立临时政府，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。如果当时革命领导人物能够不动摇、不妥协，革命事业或不致迅趋失败。但是大多数的革命领导者满足于一时的胜利，主张南北议和，而孙中山先生就不能不让位于袁世凯。这是政治上一大错误（后来孙中山致苏联齐采林书所坦白承认的）。

(二)

在我当时看来，能够认识这一错误的，似乎只有朱执信先生。朱于辛亥之次年（即民国元年）在广州即着眼于紧靠民军，编练与整顿民军作为建立基本革命武装，自然他收编了不少农村中的绿林人物，因为他反对利用旧军阀作风，他根本不相信当时由巡防营陆军等转变过来的那些

队伍。他为着要把起自民间的民军健全起来，于是派出了若干有革命思想的陆军学生到各民军队伍中担任教练员，我就是其中之一，我是教练顺德绿林首领黎炳球这一营的。其时广东都督陈炯明态度与朱相反。且对民军首领屡加迫害。石锦泉被杀了，王和顺、陆兰清被驱逐了。我在广州始终追随朱执信先生工作，我觉得当时国民党领导人中，他是最可敬佩的一人。

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，宋教仁被刺死，六月间孙中山到日本从新组织中华革命党，中山左右高级干部多数怀疑这一举动，而朱执信则坚决拥护。七月，李烈钧举兵湖口，各地响应组织讨袁军，当时我参加李烈钧的行列，失败后，逃到上海。

经过袁世凯称帝，唐继尧独立，所谓“护法之役”，一九一六年李烈钧率部与桂军到达广州驱走龙济光，我当时在李烈钧统率下的滇军任少校参谋职。直至一九一八年，陈炯明在汕头成立“援闽粤军”，邓铿任总参谋长，我就转到邓铿幕下任少校参谋。随军进攻福建，我参预漳州江东桥之战役。但当漳州占领之后，陈炯明即安于富庶的闽南，开始作逐利之计。我不满这种军阀割据作风，便离开漳州回到广州。

(三)

经过孙中山炮击莫荣新这一幕之后，孙偕朱执信到了上海，当时孙左右的一班高级干部都一致埋怨朱执信，说朱不应独自密赞孙而助成炮击事件。又说朱不肯改去“绿林民军”的作风。一九一九年夏间，我接到朱先生由上海

来信，要我到上海工作。我于是到上海，见过孙中山、廖仲恺，知道朱先生正在筹办建设杂志。我就在这杂志社里面做发行业务工作。朱先生的革命理论，我在此学习不少。

是时刚在“五四”运动之后，胡适及其附和者已表露他的思想；把新文化运动局限于白话文运动，朱先生就感到这是“新文化的危机”，他曾这样说：“阶级斗争是现存的事实，不是想出来的手段”。他斥责空谈“奋斗”，而实际反对阶级斗争的那些人们。他对知行的说法，比之孙中山先生似有较深认识，他说：“真正学问，是同社会有脉络贯通的，同实际生活联成一气的，没有做事，他这学问是悬空的”。他对于群众运动也有较进步的看法，他认为“群众运动真实的力量是多数的意志力”，他觉得当时“不留名声，不留目标”的一类群众运动促进者实在太少。他创办建设杂志是在于对群众运动作思想教育。其时孙中山及其左右已开始认识“联苏”与“扶助农工”的重要，当然除了朱执信及廖仲恺之外，其他还是主张由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。

孙中山希望取得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，他决定派朱执认往苏联考察，并指定我做朱的助手。朱先生和我即做些准备工作并学习俄文、俄语。但是到一九二〇年十月粤军从漳州回粤驱逐了陆荣廷、莫荣新，在广州恢复“护法政府”。朱执信即随孙中山返粤，赴苏联考察计划无形打消。朱返粤不久，突然被刺，他的遇害，是革命的一大损失。其后，我借着机会由廖仲恺先生指示并给我旅行所需的资料，我终于到达了苏联伯兰俄维辛（当时称远东共和国）因为其时赤塔有战争，我不能完成我的旅行，乃辗转经天津返广州。向孙中山作一个简单的旅行报告。

(四)

一九二一年，我被派到邓铿的陆军第一师工作，任工兵营营长之职。同事中有叶挺、邓演达等。孙中山深感革命进行不能停滞，于是准备出兵湖南，进行北伐，把当时在广西的滇、赣、粤各军集中，在桂林设立大元帅府行营；但坐镇广州的陈炯明别有企图，他暗中勾结了吴佩孚，秘密破坏北伐军事。在广州的将领有实力而最积极革命者只有邓铿一人，孙遂嘱邓在其部队中挑选青年干部组织警卫团，随帅府行营任警卫之责。以三个步营及机枪一连编成为警卫团，陈可钰任团长，我任副团长，因陈可钰兼任师部参谋长，不能离开广州，故警卫团实际由我率领开赴桂林负担任务。其后警卫团扩成两团，我任第二团团团长兼大元帅府参军。

正在桂林布置北伐军事，准备由全州入湘之际，而陈炯明破坏北伐的举动渐趋显著，他断绝了北伐军的后方接济，竟纵其部下暗杀了邓铿。这个暗杀消息一到桂林，大家都知道局面破裂了。孙中山遂率领警卫团回粤，陈炯明则避回惠州。孙仍图感化说服陈炯明，但陈已包藏祸心，命洪兆麟、叶举等克期作乱。于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夜间围攻观音山总统府。警卫团寡不敌众，给他们攻入缴械，孙中山事先已化装避至永丰舰，次日我亦逃至舰上。舰队集中黄埔坚持一个多月，同时号召北伐军由北江回师反攻。其时廖仲恺先生已被诱捕于石龙，北伐军一时未能回穗，孙中山乃离粤赴上海，在此时期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和孙中山会谈了两天，给孙中山以很大的影响，续后孙中山接待苏联特使越飞，经过商谈之后，表示

接受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，发表了有名的“孙越共同宣言”。

回师广州未成的北伐军，由许崇智率领越江西边境攻入福建，把北洋军阀李厚基打败，占领福州，成立东路讨贼军总部。我就被派到福州任总部副官长职，蒋介石荐委他的亲信刘峙，顾祝同到副官处当副官。那时我对蒋介石还很客气。

一九二三年二月东路军由闽回粤，时广西的杨希闵、刘镇环已攻走陈炯明，占据广州。孙中山重返广州。一九二四年一月，举行改组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，通过了体现三大政策的“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”。中国革命便得到了比过去进一步的发展。在此期间，我已辞去军事职务，跟随廖仲恺先生做些零碎的党务工作。

(五)

在一九二四年至二五年间，经过了有名的省港大罢工，经过了镇压商团暴动，帝国主义惊惶失措，一九二四年底，孙中山为了和平救国，北上会晤段祺瑞，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病逝于北京。其后廖仲恺先生又遭反动派暗杀。中国革命运动受到了重大损失。我精神上所受到自有生以来的极沉重的打击，实难以言语形容。

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，蒋介石被任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，宣告开始北伐。可是在此以前，即孙中山逝世不久，国民党的右派邹鲁、谢持、林森、居正等召开了西山会议，公开反对三大政策。另一派以蒋介石为首的罪恶集团，表面伪装拥护革命，暗中组织反革命活动。（最清楚的事实

是：迫走苏联友人基散加，用武力围住东山一带的苏联友人各住宅，并挟持汪精卫，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做出来。）到后来，北伐军到达上海，即为帝国主义所收买，立心做帝国主义忠实走狗，发动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的叛变——“清党”大屠杀。

在一九二六年二月，我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，倾向进步，与中共同志杨殷、杨匏安、邓中夏经常联系。我认为警察应与群众建立亲密关系，于十月间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工警联欢会，我强调工警合作。不料却为张静江（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主持后方负责者）所不满，传召我去见他，当面责骂，说我言论太左，“举动乖张”。他随即密电蒋介石，要我辞职，我就实行辞退，由蒋介石派钱大钧来接任。我的辞公安局长职，意味着广州政治气压的低沉，进步群众预感到逆流迅将到来。我自此一辞职之后，即在香港隐藏居住。其时杨殷曾到香港访我，挽我出来工作，我那时彷徨歧路，未敢即时答应。不久，“清党”屠杀竟尔开始。

一九二七年张发奎率军南下，反对李济深支持汪精卫。我于那年十一月初，由香港返广州，会见了张发奎。匆促间，往福州走了一次，主要是劝蒋光鼐、蔡廷锴等与张发奎合作，但无结果。这里，我得回溯一下。当孙中山逝世与廖仲恺先生被害之后，没有一个像朱执信那样的人。在我心目中，清精卫是比较进步的。当然，后来我发觉他是投机善变的人物，就与他疏远了。当在蒋介石暗中组织反革命活动时候，他却自认为“革命派”，并认为“无论共产党、非共产党，都应一致努力为革命而奋斗”。这些话是很动听的，我也或多或少被他的话吸引了。是年十

二月十一日，广州公社起义，我于次日即由广州回香港。一九二九及一九三〇年汪精卫在北京、广州发起并举行过扩大会议，非常会议，汪派陈公博、沈崧前后携函邀我参加，（我还记得，汪在赴北京时亲笔给我的函里有句话：

“国家民族之安危，革命大业之成败，在此一行，个人荣辱得失非所计也”。）（此函我在香港时曾给朋友陈此生看过的。）我都婉词推却。但在反蒋意义上，只接受他委托赴赣州，劝陈铭枢、蒋光鼐联合陈济棠反蒋，但无结果而回香港。

数十年来，蒋介石专横独裁，狂暴凶恶，固非推翻他的统治不可，但经过多次国民党内部反蒋事件，我对革命有进一步的认识，深觉得非从根本上进行变革不可，所以我对于汪的改级组委员会及胡的新国民党组织等根本不同情。

（六）

蒋介石的剿共卖国政策，使中华民族蒙受了空前的灾难。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，日本帝国主义爆发了沈阳事变，蒋下令不抵抗，转瞬间而东北全部沦陷。翌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“八一”宣言，号召全国团结抗日。这一正义的呼声，使我很受感动。“一·二八”前夕，我承蒋光鼐之邀，到了上海，不数日，十九路军发动了淞沪抗日战争，我以私人资格协助。这次战争为蒋介石叛卖而结束。

一九三二年冬间，宋子文着陆文澜携函并蒋介石的亲笔函到香港访我出来做事。陆文澜说：“蒋介石拟发表蒋光鼐为福建省府主席，蔡廷锴为福建省绥靖主任，要我当

福建省府委员兼秘书长”。我作过这样的考虑，就是说，经过淞沪抗战的十九路军，其中可能有些分子是积极反蒋的，因此我就答应了他。过了若干日子，蒋介石电催我到汉口，向我说明闽省府人事安置情形，随后就把名单全部发表了。我到福建就职后不久，见诸事困难，情况复杂，我虽然替他们起草过一个“粤、桂、赣、闽四省联盟约章草案”，但不能真正实施，我于是请假离开福州回到香港。及至福州革命起事前十余日，我由香港到福州，参加福州革命政府任中央委员兼政治保安局局长职，当时有些人对于完全站在国民党外反南京这一问题，似乎仍有多少顾虑与犹疑，主要是为着怕粤、桂、闽联盟破裂所生之后果。我觉得这回事无可迟疑的，粤、桂、闽联盟徒有其名而已，后来福州革命宣言一发出，桂派就来反对，足证所谓“联盟”实在是无基础的。我建议应立即宣告脱离国民党，重新组织革命政团，进行革命，大家推我起草脱党宣言，并由我领衔发出。福州革命军事失败，大家又推我赶快到香港见胡汉民商量善后收拾办法。我到香港见胡之时，适孙科亦在座，胡则婉言权不在己，孙则直接责难，我遂无言而退。此后我参加了民族革命大同盟的组织，又与何思敬等组织救国会南方总支部，鼓吹抗日救国。

一九三七年“七七”，抗日战争发动，全国无分南北老幼，奋起抗日，我以救国会负责人资格鼓吹坚持团结，坚持抗战。一九三八年十月，广州陷敌，余汉谋退北江，我集合同志，策划组织抗日武装。适值叶挺辞“广东第四游击司令”职，“四战区”命我继任，我到深圳设立指挥机构，领导工作，但游击队伍大部分分散，又恐汉奸混入，使组织不纯。最纯洁而组织化纪律化的只有曾生、王作尧